

今天 2013年秋季号 总 102 期

## 目 录

### 评论

80后，怎么办？  
杨庆祥

### 顾城纪念小辑

编者按（北岛）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舒婷

在上海武夷路的日子  
——回忆顾城  
毅伟

蝉蜕  
王安忆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陈力川

“一个精美的天空”  
尚德兰（法国）

顾城是一座孤城  
大仙

顾城二三事  
顾彬（德国）

最后的日子  
顾晓阳

猎人与野兔  
艾略特·温伯格（美国）

## 评论

诗人之死  
胡亮

## 小说

一根火柴（外一篇）  
赵志明

你应该现实点（外一篇）  
魏思孝

班车（外六篇）  
谈波

金刚钻（外六篇）  
韩梅

新生活  
朱庆和

兔子  
张敦

自死  
朱白

狗日  
曹寇

## 随笔

苦难的快乐最苦难  
——甘肃宕昌好梯乡苟家院村小学支教记  
段以苓

## 今天艺术

许村的启示

鲍昆

作为乡村基因库的许村  
——渠岩与鲍昆的对谈

## 顾城纪念专辑

###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舒婷

1993年10月，我从福建转程北京，应维也纳大学邀请，即将飞往奥地利。在福建驻京办事处的宾馆里，有一位小名叫阿毛的记者来找我。我向来不接受采访，虽然是熟知的朋友，也不愿破例。离家之前，我刚从国外的长途电话中惊悉噩耗，于是下来大堂见他，其实只是为了多了解些详情。那年代没有互联网，所有资讯都很慢很破碎。阿毛具有记者的敏锐和优势，第一时间获知新闻，又知道我恰巧在北京，立刻赶来试探。

后来阿毛在他短短的文章里，说我“面无表情地离开，走进电梯的背影很是疲倦沉重。”

距离顾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

#### 一. 童话诗人

——给 G·C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你的眼睛省略过  
病树、颓墙  
锈崩的铁栅  
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  
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蝥蛄的队伍  
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  
出发

心也许很小很小  
世界却很大很大

于是，人们相信了你

相信了雨后的塔松  
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  
桑葚、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  
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  
无数被摇撼的记忆  
抖落岁月的尘沙  
以纯银一样的声音  
和你的梦对话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1980.4

这首标明写于1980年4月的手稿，应当修正于1981年。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

年轻诗人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北京。诗刊社在虎坊桥的旧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朴素简易的小楼房，海棠果已经累累枝头。

正式报到的那一天，小会议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径直走到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年顾城24岁。

我已得知这批学员中，有《今天》的两位同仁，与顾城虽然初次见面，自是乡党一样格外亲。顾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来亲切握手，手上有烟卷味。

这就都认识了。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到会，我们便臭气相投形影不离。不过，我们外地人借住在办公室的临时宿舍里，北京学员只能“走读”。平日里，写作修炼各行其是，听报告或讨论学习才集中一起，而江河是几乎不来的。

诗刊不开伙食，我们被安排在歌剧院（话剧院？）搭伙。在排队打饭菜的时候，江河告诉我，顾城很郁闷，因为安排的辅导老师严词厉色训了他。我们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师，把顾城调到邵燕祥老师的麾下，顾城就此获释。我们几位女诗人都划归严辰老师，他像菩萨一样慈眉善眼，对我们呵护有加。

诗会把尾声放在北戴河，而今回想，应是最经济实惠最具效益的公费旅游。（我的第一次公费旅游，当算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大串联了。）

那真是青春鼎沸的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呆在沙滩上，彻夜不眠。礁石上溅泼的磷光，飞鱼掠过海面的水花，月亮在幽蓝的天幕上，很是清凉洁净。我抱膝坐在一条大浴巾上，江河顾城则半卧半坐着。顺手捋开灌木丛上的星光点点，哦，后面还有梁小斌呢。

顾城约我去踩浪，江河会意地微笑着，他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挽起裤管顺着浅滩漫步，顾城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嵌着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辫子，明亮大眼睛，是谢烨。

他们的结识很浪漫。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假装读报，报纸挖一个窟窿偷看着。被发现了并不说破，那人只是红着脸，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匆匆把写着地址的纸片塞在女孩手中。于是“两地书”热烈展开。唉，没有手机的岁月，顾城的诗人气质必定更加发扬光大，经受距离的考验和谢家的担忧不看好，爱情最终瓜熟蒂落。

1983年，顾城谢烨来到鼓浪屿，说是度蜜月。我的儿子不到一岁，体质荏弱，住院挂瓶，我每天奔波医院。遂让他们住百米外的父亲家。朋友们来鼓浪屿，基本都由我父亲接待，从最早的艾未未、后来的芒克到江河。北岛曾多次说要到鼓浪屿看我，后来他听邵飞说，鼓浪屿不过是座大花园，就不来了。哼，我记恨着呢！

顾城夫妇住父亲的卧室，父亲搬去鸟房。父亲爱鸟，鸟房只有6平方米。

酷爱烹调的父亲，熬费心思安排手中的肉票、鱼票、糖票、豆干票，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好吃的。哥哥嫂嫂下班过海到家要中午一点多了，父亲怕饿着客人，让他们先吃饭。等哥嫂回家，掀开纱罩，四菜一汤均已扫荡得干干净净，连菜汁都不留。这以后，父亲不厌其烦分两次做饭，还很自豪：因为顾城小俩口最能欣赏父亲的手艺，总是迫不及待、欢天喜地，让碗盘一一见底。

听朋友转述一则轶闻：说数年之后顾城夫妇辗转英国，邀请时间结束后，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阖家旅游去了，待他们回家，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大概85年吧？福建东山举办“蝴蝶岛诗会”，我代邀请了江河、顾城、杨牧、傅天琳、陈所巨等老朋友。顾城信里问：能不能带谢烨？主办方没有多少经费，东山诗人刘小龙很为难，我便硬起心肠答：不！

于是顾城、江河等朋友都来了，玩得很开心。顾城总是赖在海滩上不走：我就埋在沙堆里，你们明天来刨我吧。东山的鱼虾蛤蚌又鲜又肥，众人每日里呼噜碰杯大快朵颐，唯顾城闷闷不乐。那晚见他站在窗前郁郁寡欢，问他。他答：这里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谢烨想吃个炒鸡蛋都不容易。

我太内疚了，至今不能释怀。

八十年代，凡有会议在北京，朋友们都会相约来宾馆看望我。尽管他们之间并不那么和谐，我常开玩笑说他们：两雄不能并立呗。他们带上换洗衣服，轮流上卫生间洗澡，门开开合合，房间里热气蒸腾，人人面如桃花。这时候顾城总会频频起身探头窗外，看看他们那辆破自行车还在不在。很奇怪，公交车票不过一毛钱，何苦大寒风里奋勇踩车向前？顾城解释：两人便要两毛钱，两毛钱够买几斤白菜了。那年代，大白菜一斤也就几分钱。俩口子的伙食就是一大锅白菜粉丝，日日顿顿不变。

那时候的会议是不能蹭饭的。我把大家领到附近的小饭馆，塑料杯装啤酒，杂酱面，大拌菜，京城随处可遇的家常菜罢。其他人都在座位上等待，只有手头最拮据的顾城和我抢着付钱，他预先准备的那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块钱，已经算是巨款。

顾城谢烨争着和我说一个小故事（他们两人向来争着说同一件事情，互相插嘴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故事结局让人辛酸，说起来却是兴高采烈声情并茂）。

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随便挑着发吧。于是稿费三元五元零星地汇来，白菜粉丝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来了一笔 50 元巨款，小两口商量后，手拉着手步行穿过八一湖公园，去小储蓄所存钱。次日，不幸车轮胎爆了要换，两人相挽去取十块钱；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贱卖，又取十块钱；再一天，他们刚进储蓄所，还未开口，柜员先发话了：“你们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块钱一起取走？”说的也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这样来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大概这段时间里，马悦然夫妇来鼓浪屿家中做客，用过便餐，我送他们到轮渡。他叮嘱我说：“舒婷，你多照顾点顾城吧。你看你生活得这么好，而顾城什么也没有。”

是的，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选择：“以纯银一般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

## 二. 放逐孤岛

### 放逐荒岛

以童年的姿态

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

你捡柴禾，割牧草

种两距瘦伶伶的老玉米

偶尔抬头

送一行行候鸟归路

纽西兰海域此刻无风

你的眼睛起雾了

他们在外面时

你在里面

鲜红的喙无助地叩响高墙

故国的天空

布满你的血痕

现在你到了外面

他们在里面

所有暗门嗒拉上锁

既然你已降落彼岸，就再不能

回到诞生的地方  
眺望的方向不变  
脚已踩在另一极磁场

黑眼睛妻子  
坐在门槛上哺乳  
发辫紧紧盘在头顶  
有如一朵结实的向日葵  
微笑着转动着  
寻求你的光源而粲然  
你用中山装的衣袖擦擦汗  
站稳双足  
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渐渐金黄

1990. 5. 16

1986年5月，我应邀去了美国，先到旧金山，到纽约，再到明尼阿波里斯，到斯丹佛、伯克利等好几个大学去朗诵和讲座。省里给的出国批文是三个月。

在纽约时，与美国诗人金斯堡几次见面，他主持我的朗诵会，并邀请我到他家去喝下午茶。他是艾未未的好朋友。我们三人讨论商谈举办一场《北京-纽约》的诗歌活动。中国诗人名单由我提供。顾城江河杨炼李钢……十来个人吧？

1987年，邀请函发来，我的护照申请却被断然拒绝。原因是1986年那次出访，由于当时我正在美国，中国作协让我顺路参加洛杉矶大学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谈”。我已经提前离会匆匆返程，没有精准计算到时差，还是比期限延误一天，因之严厉受罚。不怪当时经办的官员，盖因铁规如此。

想了很多办法，求王蒙帮忙，让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给省里打电话解释担保，无果。金斯堡急了，甚至说服美国外交部属下一个什么机构给省外办发函，也许更加惹怒招恨，终不得成行。

那次活动究竟都有哪些诗人获得通行，我也记不得了。只听说江河是一下飞机，两手空空，宣称“壮士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他一直窝在纽约不动。顾城夫妇却是回不得家的，他们告诉我，因为北京已经没有住处了。

还好中国诗歌刚刚走出国界，朦胧诗大盛。一个个诗歌节、国际笔会、大学演讲、驻校作家的邀请纷沓而来。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泊，在上一个活动和下一个活动之中，去熟人、朋友家中过度等待，甚至被安排或介绍到素昧平生的屋子里借居。

谢烨怀孕了，就算有的邀请条件不错，那些国家的签证却很难得到。他们很幸运地，在香港获得新西兰签证。顾城说，面签时，谢烨怀胎都快八个月了。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不敢起来走动怕露馅，而签证官大概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吧？



出国后顾城给我的书信很少，大概是邮费太贵？难得写满几张信纸，常常短短半张而已。有时呼我干姐姐，有时赐封我“鼓浪屿大公”，自称“可汗”。字迹大大的，孩子气的，总是东一句西一句，读了心中微笑。有关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多半是从朋友那里听说，在新西兰定居啦，生儿子啦，开始种庄稼啦。我真以为顾城已经心如所愿：“**以童年的姿态/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关于顾城在新西兰的生活，旁观追忆很多。顾城自己也在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二十年来，这方面的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我收到的也不少。可是我并不大浏览它们。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

1992年5月，《今天》的大部分同仁被邀请到美国巡回朗诵演讲。老朋友们之间距离隔阂更加明显，当然，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在那团乱麻里面。一帮人从旧金山到纽约，共同旅行十多天里，还是顾城谢烨与我亲密，他们描述新西兰日子时，语气幽默快活，实质依然艰辛坎坷。

顾城在报纸上看到激流岛（那时应当不是这个岛名吧？中国人的译音？还是后来作为旅游景点的包装？）有座小屋被拍卖，占地不小却蛮便宜。他有大学教职，可以贷款。童年时期顾城就梦想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风摇它的叶子，草结它的种子”。他不加思索拍下这个岛，并获得贷款两万元，两口子很快搬到小岛居住。

顾城说：花了二十多年，才跨过那个倒霉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

顾城在奥克兰大学的聘约很快到期。一开始，他还不怎么在乎，但是还贷的重枷很快显示分量，几乎把他压垮。

这个小岛退潮时露出沙地，可以步行或驱车通过，抵达民风淳朴的毛利人部落和热闹集市。涨潮即汪洋一片，真正成为孤岛。没有料及的是，小岛向阳那一面乱石叠嶂，背阴这一面长不出庄稼，顾城的农场计划因此泡汤。矗在半山斜坡上的小屋已经破败，他们俩没有力气，只好从山上合力把大石头推下来，先将就铺一条滚石道。后来顾城是如何学会凿石修缮，操作细节我已经模糊，想来必定殚精竭虑，比堆砌文字难上百倍。岛上没有水源，他们在屋顶砌了蓄水池，饮用、沐浴、洗涤。拜老天所赐，新西兰气候总是风调雨顺。若接不上呢？顾城笑嘻嘻：那就几天不洗澡。岛上空气纤尘不染呢。

“种二十回萝卜就可以了此一生”的梦想既已破灭，顾城夫妇想到养殖。他们去集市买了两百多只小鸡，垒了石栏圈养。鸡苗儿由机器孵化，几代下来都是农场模式流水线养殖，没有母鸡教诲，遗传密码里的自动觅食功能早已丧失殆尽。童鸡们集体发呆绝食。他们俩只好一人一头抬着食槽，模仿机器左右摇晃，才将小鸡们的初级课程教会。小鸡渐半大，纷纷越狱飞过鸡栏，诗意地栖居于石缝草窝灌木丛里，成了都市人垂涎欲滴的跑地鸡。

可以准备收获鸡蛋了。

不料执法人员突然露面，意外的困难再度发生。原来根据当地法律，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头鸡（想起我们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吧？）。他们被勒令三

天内处理这些有翅膀的新岛民，不管他们看上去多么斑斓多么无辜多么与世无争。

现在要召集鸡们没有那么容易了。顾城夫妇只好夜里捏着手电筒，满山遍野去捉拿被强光晃花眼的瞌睡鸡，顾城只敢捉脚，让**黑眼睛妻子**咬牙割颈，连夜褪毛剖肚。顾城说：舒婷啊，简直血流成河！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为何不放生？顾城老实回答：这些都是钱哪，我们还要生活呢。甚至有人就此发表言论：说顾城之血腥是与生俱来的，居然在三天里，杀掉亲手养殖的两百多头鸡。

那么多鸡肉该如何处理啊？我替他们发愁。顾城说，鸡肉都寄存在毛利人的大冰柜里，和他们的猎物冻在一起。谢烨用鸡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摆摊。顾城闲着无聊，也想出力，就在旁边画肖像，每张标价8块钱。可是谢烨说：岛民互相认识，画好了，基本都是白白赠送，收不了几个钱。但是顾城喜欢。两千多个岛民画着画着认识了不少。顾城不懂英语，孤独很久了，因为画像，有了一些朋友。

顾城谢烨叙述这一切时还是老样子，争先恐后诙谐有趣嘻嘻哈哈，让我跟着一起咧嘴开怀，鼻尖酸着。

### 三. 破碎万花筒

黑子的运动，于  
午时一刻爆炸  
鸟都已平安越过雷区  
日蚀虽然数秒  
一步踩去就是永远的百慕大  
最后一棵树  
    伸出手臂  
悄悄耳语  
    来吧

美丽生命仅是脆弱的冰花  
生存于他人是黑暗地狱  
于自己  
却是一场旷日持久  
    左手与右手的厮杀  
黄昏时他到水边洗手，水  
不肯濯洗他的影子  
只有文字的罨粟斑斑点点

散落在  
他的秋千下  
    一顶  
    直筒  
    布帽  
静静坐在舞台中央  
灯光转暗  
他  
    不  
        回  
            家

1993. 10. 13 凌晨

回到 1992 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关于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顾城高兴，他会说，方方正正像故国的北京城。不耐烦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时候，他会顺题玄妙发挥：安全感啦避雷针啦保护伞啦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了，高帽对他其实很合适。

虽然他们在国外多年，买地置屋，安家生子，给我的感觉还是吃不饱。顾城鄙夷那些“满世界都是吃来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个人，就是一个必须吃东西的东西”。

主办方发放相当丰厚的饭钱。酒店带早餐，晚餐总是有活动和宴请，基本自己付午餐而已。我时差倒不过来，早上迟起没有胃口，只挑一块小蛋糕，掰一半慢慢啃着。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啦？我点点头，他伸手到我碟子上抓走，立刻塞到口中。我急了：顾城，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谢烨笑着解释：知道啊，他已经吃了六个。我才知道。顾城每天必定耗到早餐时间结束，尽量把自己填饱，仿佛动物有两个嗉囊一样。

中午？中午就睡觉，睡到晚上开会之前有晚餐吃的时候。失眠严重的我马上想到：那，夜里呢？夜里继续睡。谢烨说，顾城从小能睡，最高纪录连睡两天 50 多小时。

艾未未在纽约，他请我到中国城吃饭。这样那样，要了很多菜，蒸鱼啦烤大虾啦，甚至有拳头大的石螺。老板是朋友，过来提醒：菜太多了！未未说：上次我这位朋友从大陆来，我没什么钱请她吃饭，现在我要让她吃好的。未未打开钱夹给我看，哟，除了各种银行卡，还有厚叠百元大钞呢。

我这就提议，拐角就是我们住的酒店，能否把顾城夫妇邀来共进午餐？未未与那一对儿自是熟得不能再熟，当然不反对。就算多他们两个人，菜还是太丰盛。因为未未一直夹菜，我的碗里还剩很多。谢烨不但挨个把餐桌上的盘子，连汤带水倒在顾城碗里，最后还拿起我的碗，也倒给顾城了。我不知所措地瞪大眼睛。谢烨说没事！在新西兰，谢烨单独做饭，吃不完就倒在顾城的那个大锅里。顾城

就“乱炖”着吃。

可以说，顾城不在意烹调，也不仅仅是珍惜食物。他能饿，所以深知能吃饱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吃饱。好像永远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似的。让人回想起来更加难过。

当时我不太明白，顾城多年的节俭是否变成一种痼癖？因为到1992年3月，顾城在柏林DAAD的一年计划才结束，DAAD给付的生活费很高，他们应该存不少钱的。

那天饭后，我们顺路逛街，走进一家小商店。谢烨在货架上挑选很久，挑了一个小玩具，笑着给我看。那是一只小青蛙，捏一下呱一声。底部印着made in china，标价1.99美金。谢烨说：给儿子买一个中国的东西吧。临付款我才发现顾城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不进来，谢烨掏钱时，顾城竟然一屁股滑坐地上，把我大大吓了一跳，以为他犯病了，赶紧去拉他。谢烨厉声呵斥：别理他，让他去死吧。我就更吓坏了，回头看谢烨。她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

原来如此，我买吧，我正发愁给小木耳买个什么礼物好呢。

顾城并不小气。朋友吃饭他会争着付钱；那年来我家度蜜月，他送我两尺卡通印花棉布，我给儿子做了个小被套；时隔多年，在美国见面他还特别送我一支立陶宛彩漆小汤匙。东西都很小，但是让人感觉顾城有情有义，而且礼貌周到。

从商店出来，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远远避开，恨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顾城，你死了好！

我陪着顾城落在后面，作为干姐姐，我首先要数落的自然是顾城了。顾城解释着：舒婷，如果不能按期还贷，我的小岛就要被拍卖，我们就无家可归了。所以每一块钱都要存下来啊。小木耳一直寄养在毛利人部落里，酋长虽视为己出，但是根据西方伦理，酋长还是以遗弃罪把顾城告上法庭。说到木耳，顾城渐渐有了笑容。因为顾城付不起钱，毛利人竟然代顾城雇了一名律师。听起来，那毛利人仿佛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似的。在他们的观念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只是要求父母承担一点责任。法庭仲裁结果是，顾城必须每年付毛利人一点点抚养费。顾城说：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不付这一点赡养费，他们就要失去木耳的监护权。

咳，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顾城慨叹着。

我曾经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木耳。哪个木耳？白木耳的木耳。哦，顾木耳？不，没有姓，就叫木耳。

他们半开玩笑地解释过孩子的名字，也是时常更换版本，我没记住。

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里写成了桑木尔。木耳是小名吧？桑木尔也许是毛利人的习惯叫法？

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连照片也没有。

在旧金山期间，我们被邀请到美国女诗人卡洛琳·凯瑟家中做客。卡洛琳·凯瑟得过普利策奖，与赵毅衡共同翻译我的英语诗集。客人们在他们家的户外游泳池里扑腾，谢烨的游泳衣里还加穿内衣，我觉得好笑：在国外许久了，还这么遮掩吗？她努着嘴示意顾城。顾城不下水，脸色阴暗地闷坐在荫棚里。我走过去故意大声说东说西，再小声骂他太过分，直到他心情明朗起来。

因为顾城想要谢烨保持初恋时那两条长辫子，谢烨就不能剪烫，顶多把辫子紧紧盘在头顶，像朵葵花，非常漂亮。由于顾忌丈夫的感受，谢烨不戴任何饰品，她的衣服都是棉麻质地，宽松的，在西方国家也很时尚。不过，谢烨基本不买衣服，都是朋友送的，邵飞送过，我也送过。纽约分手时，我把所有衣服摊在床上，

让谢烨挑选。我清楚地记得她挑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一件水磨真丝枣红夹克和大红棉布衬衫。

1996年我应 DAAD 邀请，驻柏林作家一年。我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裤裆大街”（中国人的戏谑翻译）50号，1989年北岛应邀来此，住的就是这一栋公寓。留学生们告诉我：当年好些人聚集在这所房子收看新闻直至深夜，其中一对激愤的男女青年经常结伴并终成眷侣。1992年顾城夫妇从美国返回柏林，结束 DAAD 计划后，住在这对青年家中。男主人教会谢烨开车，带她去观光，陪她出去购物，近距离的，让谢烨看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男人。

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漂泊操心，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这一年，顾城在国外的朗诵作品时只用各种怪声没有字词，遭到诗友的批评，躲到沙发后失声痛哭。因为要坚守母语的语感，顾城拒绝学习外语，他在国外的所有交流都要依赖谢烨。那么，语言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

**“黑子的运动，于午时一刻爆炸。”**

即使根据目击者的作证，警察部门的结论，事后得以理性的剖析那一幕悲剧。但，谁能真正还原黑子运动的轨迹，那个深渊的无限黑暗，那一脚踩下去的万念俱灰？

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2013. 9. 15

## 在上海武夷路的日子

——回忆顾城

毅伟

每次与北岛在一起，都必然会谈起顾城，感慨与伤感顾城的离去。

今年，已是顾城离去的二十个年头了。当年他把自己定格在 37 岁，以至于今天，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感觉他还是那样年轻。

北岛是我和顾城共同的大哥，他一再嘱咐我，写一写顾城在上海的往事，以表达对他的怀念。我意识到，我必须去完成这个回忆了。

二十年前，当顾城与谢烨的噩耗传来，就有些熟悉的媒体要求采访我，其中有些记者与编辑还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我都婉言谢绝了他们，因为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噩耗，我无从说起，也害怕说起，因为顾城与谢烨，都是我熟悉的朋友，在那样的时刻，我说什么都不合适，都可能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感谢北岛的鼓励，二十年后，让我终于有了内心的力量，再说起顾城。

一

为了这份回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了当年顾城在上海居住过的武夷路，那是上海西面长宁区的一条老街道，为了寻找当时的印象，我在那里徘徊了许久，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时过境迁，以往痕迹都难以找寻，那些过去的情景还依然可以追溯吗？

当年，顾城为了谢烨，为了与谢烨的一场奇特的恋爱，来到上海，先是住在虹口区多伦路的亲戚家里，之后他选择了谢烨居住的长宁区，选择了靠近谢烨家的武夷路，购置了一所很简易的民居，在此居住下来。如今想来，顾城的这个举动，当然是一个爱的举动，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沧桑的开始。

而今天，当年顾城所居住过的这个区域，已经事过境迁。

尽管武夷路还是那样窄窄的一条街道，但是周边的环境以及建筑完全变了，尤其是顾城当年所居住过的那个平民区域已经不复存在，在原来的地址上已经建起一个很大的体操馆，许多人在体操馆前的广场上乘凉，灯光照耀之下，孩子们在奔跑。

人们并不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诗人，一个看我们很远，看云却很近的诗人，一个用他那黑色眼睛去看世界，用他那近似童年的真诚去大声朗诵的诗人。

那条过去夜晚亮着黄色灯光的静静的武夷路，那个为顾城打印过许多诗稿的打印社，那个见证了顾城与谢烨的浪漫爱情的小屋，已经完全消逝了，消逝得干干净净。好像是一部生动的电影从胶片上完全消逝。

物已不是，人也已非，剩下的只有我们的怀念，顾城与谢烨，你们还记得这条街道吗？这条位于上海西部的，承载过你们爱情的街道。

## 二

当年，顾城告诉我，他买下了一个小屋，位于长宁区的武夷路，花了四千多元钱，他打算搬到那里去住，因为那里靠近谢烨的家，他叫我和他一起去看。

我和顾城一起去了武夷路，顾城购置房屋的地点在武夷路靠近中山西路的那个位置，在过去的长宁区足球场的旁边，是在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平民住宅区域，进入这个区域，看到房子密密麻麻，房子的高低也参差不齐，里面的路也因为有许多搭建房屋而显的很窄。

顾城购买的房屋，似乎是居民自己搭建的一个简易小屋，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从一条很窄的小弄堂进去，进入一道门，里面有个上海人称之为天井的空间，边上煮饭的地方，里面就是一间上下两层的屋子，下面一层大约十五平米，上面一层其实是阁楼，更小些。

我和顾城开玩笑，说这其实是一个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也很认真地告诉他，如果要住，必须要修缮，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修缮，因为这房子的结构是竹子与砖。他说他也觉得房子需要加固和修缮一下，已经请了人来修。

顾城有些兴奋，因为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但又觉得修房子的事情很麻烦，毕竟他不擅长做这些很具体的事。当时，谢烨的弟弟，也在帮着顾城做联系安排修房子的事。谢烨的弟弟，一直很尊重谢烨与顾城，顾城与谢烨也很爱护这个弟弟，他们之间的亲情与眼神，让我印象深刻。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武夷路找顾城，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正准备离开，在弄堂口看见顾城与谢烨急急忙忙地提着很重的东西回来了，进了院子，他们把提的东西放下，在灯下，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为了修缮房屋，带着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拿黄沙与水泥。

两人气喘吁吁，先前的紧张开始松弛下来。谢烨笑着说顾城胆小，还没有拿东西就已经怕了，顾城说自己就是做不了坏人坏事，说完了也大笑起来。但是他们俩看看拿回的黄沙水泥还不够，却又打算再去工地。我拦住他们，劝他们别这样再去工地冒险了，他们也不是干这事的人。

第二天我去找了一个朋友，让朋友帮忙，装了几包水泥与黄沙，我用自行车运过去，顾城见了我，还开玩笑说我是避免了让他再犯错误。

## 三

房屋修缮好之后，顾城住进了武夷路小屋里，这似乎让他开始了焕然一新的生活，因为有了自己的居住地，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这个小屋是他居住与写作的地方，也是他与谢烨相会的地方。

这个武夷路小屋来过许多顾城的朋友与客人，北岛不止一次来看望顾城，前辈诗人王辛笛先生、姜金城先生也和我一起去看过顾城，记得还有一位非常热情的德国汉学家来向顾城约稿。我也曾在这里遇到顾城的父亲顾工先生。

那时在这个小屋里，充满了温馨与快乐的气息。顾城也常常是带着他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

我去武夷路小屋，常常见到顾城坐在天井里洗衣服，木盆里放着搓板，他在搓衣服。他说他洗衣服的诀窍是让衣服在水里多浸一会儿，这样脏东西自然会掉在水里，说这是科学方法，谢烨和我都说他这是懒汉理论。有时谢烨看不下去，

就替顾城洗衣服。

顾城煮饭是烧一大锅水，然后放入排骨煮一会，之后再放入一棵一棵的青菜，最后放入面条，并自称是营养烹调，端出来招待你的时候，还显得很自豪。只有谢烨在的时候，可能会由谢烨把菜切成一段一段。

每周有几个晚上是谢烨去徐汇区业余大学读书的时候，顾城总是会在谢烨快放学的时候，赶去徐汇区天钥桥路的学校门口接谢烨，然后送谢烨回家。

顾城写过一首诗，“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他说是在接谢烨放学时的感受，因为谢烨出于羞涩，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有男友来接她。必须走得离学校远一点，他们才并肩而行。在这首诗中，可以读到顾城那颗敏感的心，读到当时顾城与谢烨的恋人心态。

顾城告诉过我，每次晚上接了谢烨放学，把谢烨送回家里，自己再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总是想着要快些与谢烨结婚，快些结束现在的状态，希望快些结婚成家。

我明白，他为了在火车上的神奇相遇而燃起的爱情，为了谢烨，来到上海，甚至买了房子住下，追求这场婚姻，但上海并不是他准备长期生活的地方。他是希望在完婚之后，把谢烨带去北京。

#### 四

在与谢烨恋爱和追求结婚的过程中，顾城的没有固定工作始终受到质疑，顾城被认为有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不务正业。这给了顾城很大的压力，因为这关系到他与谢烨恋爱能否继续，当然也关系到他们能否喜结连理。

顾城在这种压力之下，更加发奋写诗，力求多发表诗以获得稿费，来证明可以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在武夷路的小屋里，他的写作非常勤奋，投稿也很非常努力。

在武夷路小屋里，常常见到他写好的诗，抄出许多诗稿，有些是送出去打印好，分开装在一个个写好地址的信封里，然后把几十个信封在桌子上一个叠一个地排开，然后用一支排笔，一下子给几十个信封的封口涂上胶水，之后在把信封的封口一个个封好，叠在一起。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象一个专业的工匠，很认真，别人也插不上手。

顾城很得意，说这是流水化作业。之后他就会把投稿信装进一个大书包，背着书包去邮局寄稿。那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很大，节奏很快，我们说他变得很敏捷，其实这一切源于他内心的压力。

记得当时的稿费很低，尤其是诗歌的稿费。一首诗一般也就是十几块钱的稿费，而且刊物还分级别，如果刊物级别低些，甚至只有七八块钱的稿费。顾城告诉我，他拿到的最低的一首诗的稿费，只有四块钱。

顾城所受到的另一个质疑，是有人认为顾城有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需要去医院做检查。

顾城作为诗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为常人所难以理解。那些世俗常人当然不会理解，顾城竟然会为了一个火车上的邂逅，从北京跑到上海来买一所旧房子住下来追求爱情，也不会理解他的没有去找一般的工作，是因为他有着对于诗的热爱，有着自己的美学理想，作为一个在追求理想的人，他必然会对世俗有毅然决然的背叛。



在得知希望他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的意见后，顾城很不高兴，他坚信自己没有病，他认为他与那些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是，他又很冷静地说，为了与谢烨的结合，他愿意去医院检查，尽管谢烨也认为他不必要去，但他还是对我说他决定去。

我很想劝阻他，也几次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我知道他这样去医院检查，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甚至会受到心理伤害，但是我更理解他是在压力之下，他是在追求爱情的结果，我明白他一定会去。

顾城勇敢地去精神病医院了。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是谢烨陪同顾城去医院做这个沉重的检查。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赶去武夷路小屋，顾城与谢烨已经回来了，他们一起在准备晚饭。

顾城和谢烨见到我就说，今天在医院里，顾城给医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把医生侃晕了，医生说你这样的思维与表达，都很正常啊，医生甚至说对于弗洛伊德，顾城懂得比自己多。

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检查，医生的结论是顾城没有精神病症。

尽管顾城与谢烨都很高兴，高兴医生证明了顾城的精神正常，高兴可以回绝那些对于顾城精神是否正常的质疑。我还是深深感到顾城的不容易，感到他内心积压着的忍受，这种积压着的忍受会爆发吗？这让我很是不安。因为顾城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忍受的人。

## 五

顾城从北京来到上海，没想到一场政治运动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当年类似惊悚片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顾城是从他的半导体小收音机里听到的。

那天上午，我去与顾城讨论朋友的一些新发表的诗。一进门，看见他站在放收音机的一个矮柜前仔细听着广播，最认真最紧张的时候，他把收音机拿起来，贴在耳朵上听。听完广播后，他很紧张地对我说，情况很遭，一场份量很重的政治运动要开始了，自己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原因是前几年，顾城在诗刊的一个学习班上，写过“黄河是一块尸布”这样的诗句，被认为大逆不道，成了屡屡被拿出来敲打顾城的案底。顾城预感到这次运动一来，少不了又要重提此事，以后自己肯定被封杀，再也出不了诗集了，而自己与舒婷的正在出版社付印的诗歌合集，很可能是自己能出的最后一本诗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顾城几乎是灵机一动地作了一个决定，把他与舒婷的诗歌合集，从原来的三万册的印数，增加到六万册，并且马上通知了出版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这个决策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他与舒婷的这本合集，在当时的诗歌爱好者中广为流传，二是因为卖这六万本书，顾城很操心，因为出版社追着他要钱。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张旗鼓，宣传力度很大，顾城还是不愿意放下那个小收音机，连续几天在听消息听社论，各方传来的消息都是大惊失色，诚惶诚恐，顾城的精神很焦虑。

我想了一个出游计划，让顾城和我一起去我的祖籍所在地苏州东山旅游，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半岛，我们可以在那里避开喧嚣。我对顾城与谢烨说了我的想

法，他们一致同意。

之后，我们第二天去买火车票，第三天就去了苏州东山，一行四人，顾城与谢烨，我和我的女友。我们坐着火车到了苏州，再坐汽车到了风景秀丽的东山，住在了我的亲戚家里。

那是秋天，山上的桔树林里挂满了桔子，我们在树林里穿行，去翻越那些绿色的山。我们站在山顶上，望着一个深深的山谷，那个山谷有着关于法海的传说。我对大家说了这个老人们告诉我的传说，大家听得很认真。之后，顾城笑着说我们下去会会法海吧，他带头往下走，而且完全不选择路，我们也跟着往下走，因为没有沿着路走，几乎是往下在冲，一路跌跌冲冲，满身大汗，顾城一直跑在最前头。

我们在山谷里照了相，奇怪的是回到上海冲印出来，几乎每张照片上，顾城的眼都是闭着的。今天当我再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总觉得当时乃至今天，还是有许多冥冥中的东西，我们无法领会，我们都还没有感悟到。

法海的传说、寂静的山谷、不平静的秋天、寻找世外桃源的我们、在照片中闭着眼睛的顾城——

我们在东山的一个村庄里闲逛，顾城连声说看中了一个全是用山石砌墙的民居，他走到人家里，去问房主是否会卖出这所房子，房屋的主人看着顾城，觉得很突兀，没有具体回答他。我调侃顾城，说他买房子买成习惯了，谢烨说他还打算在这里长住下来，顾城分辩说这里比城里清净。

东山有许多银杏树，有些银杏树有上百年历史，在秋天里，那黄灿灿的银杏树叶非常美丽。顾城指着一片银杏树林说，这些树随便找一棵，放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景了，他拾起了几张金黄的落叶，说可以做书签。

在东山游玩了一周之后，带着当地亲戚送的许多桔子，我们返回了上海，这起码让顾城离开了那个传播政治运动消息的收音机。

苏州东山给顾城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武夷路小屋里一面吃着东山的桔子，一面告诉我说已经把去东山的观感告诉了他的父亲顾工先生，建议他去东山旅游，好像也说到了买房的想法。我知道顾工先生后来去了东山。

## 六

顾城在上海武夷路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正好有许多时间与他讨论和交往，在一起常常会互相说起自己的经历与往事。尤其是白天，我们在武夷路小屋里，他会说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说起安徒生童话对他的影响，当然也说起许多的人与事。

顾城说自己小时候，妈妈曾经带着他一起，自己动手调制颜料，把一个褪色发白的军用书包染成另一种好看的颜色，这给了他最初的对于艺术创作过程的印象与想象。

顾城常常提起北岛，说北岛更像是他的老大哥，多次想方设法为他找工作，为他找到在外地的工作之后，还要到火车站去送他，临别时刻，还非常严肃地叮嘱他不要写错别字。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很敬重北岛，他认为北岛是儒家。

顾城把舒婷称为姐姐，他曾经为我朗诵过舒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那一夜我仿佛只有八岁。

他也说起自己在乡下放猪的经历，以后做过木匠的经历，以及幼年时在家里

墙上作画的经历，尤其是父母保护了他的这种在家里到处乱画的爱好，让他有了很大的艺术想象与表达的空间，我曾经到过顾城的家里，看到过他的家中壁画。

有一次，我和顾城一起参加了北岛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马悦然夫妇在上海的餐会，记得是在陕西北路的红房子西餐馆，记得谢烨也去了，同时出席的还有诗人裘小龙。

马悦然夫妇对顾城赞赏有嘉，非常亲切，谢烨也与马悦然的夫人相谈甚欢。回到武夷路小屋后，顾城告诉我，马悦然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四川方言，而马悦然太太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唐朝服装，我们对他们夫妇的知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文化的热情很是钦佩。

我也和顾城一起去过位于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见了著名诗人姜金城与宫玺两位老师。

一个春天里，北岛作为中国报道的编辑出差上海，他与顾城、谢烨、王小龙、蓝色、董景黎，还有我，一起去过上海植物园春游。那天顾城与谢烨老是躲着我们，要去感受二人天地，不一会又悄悄潜伏回来躲在路边，埋伏在树丛后面，等我们走近，顾城用泥块袭击我们。我还记得他扔泥块的模样，就象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调皮学生。

## 七

有一天晚上，在武夷路小屋，顾城与我商量，有个大学的学生诗社邀请他去演讲，他去还是不去。在“黄河尸布”问题之后，顾城很怕再惹事，他是想去又有些担心。我极力鼓励他去，我甚至说即使是为了卖你将要出版的诗集，你也应该去啊。同时，我还觉得他老是生活在这个小屋里，太沉闷了，应该出去活动活动。

我们聊着聊着，在说到让谢烨一起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可以让谢烨的妈妈一起去，因为听谢烨说过，她妈妈年轻时也喜欢过诗歌，我是想让谢烨的妈妈了解顾城的才华，顾城也觉得这起码可以说明自己写诗也是一项专业与工作，可以纠正别人认为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游手好闲的错误认识。

于是谢烨邀请了妈妈一起去大学听顾城演讲。到了去演讲的那个晚上，顾城与谢烨，以及谢烨的妈妈和弟弟还有我，一起去了上海师范大学，记得这个顾城诗歌演讲会的具体组织者里有王小龙的弟弟王依群。

满礼堂的大学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让顾城激动起来，他开始演讲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与热爱，讲对于诗歌美学的认识，也介绍了许多他所敬仰热爱的国内外诗人，尤其是讲到了安徒生、洛尔迦、聂鲁达、艾略特，朗诵了他们的诗。也讲到了美国的现代派小说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洪堡的礼物》。

顾城讲到诗歌时的真诚以及生动是很有魅力的，很能够打动人。他演讲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又是许多学生要求顾城签名，气氛非常热烈。演讲结束后，顾城又被邀请到小会议室，与诗社的学生干部们座谈。

整个过程，谢烨与谢烨的妈妈，还有谢烨的弟弟还有我，都在听，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也为顾城的才华横溢而高兴，并且鼓掌。

我第一次听到了顾城在一个大的场合里，用他的带着天真的声音朗诵诗歌，他的那种安徒生童话似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我。在顾城朗诵的时候，整个礼堂无比安静，我的心也无比宁静。

后来，谢烨告诉我那天回家后，谢烨妈妈很高兴地找出自己年轻时抄录的几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给谢烨看，告诉谢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

## 八

原先顾城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亲戚家住的时候，因为眼睛做了一个小的手术，眼部包着纱布，他说自己体会到了盲人的感觉，尤其是当他每天摸索着在纸上写诗的时候，他觉得这种感觉很神奇，感到自己是在接受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息。

在武夷路小屋，顾城告诉我，他觉得人的梦里有许多神奇的暗示，因此他早晨醒来，总是要回忆自己做过的梦，然后把那些梦的场景与片段，记录下来，他觉得这种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诗，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很久。这到底是顾城对于诗的悟性使然，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影响着他，我更倾向于是前者。

我一直认为顾城是一个天才诗人，犹如当年俄罗斯的普希金。他在诗里所表现出来的想象、情景、以及异想天开的感觉与愿望，让我感到他写诗有如神助。他会把自己放到离世俗生活很远的地方，让自己高高地靠近云天，再回头看这个世界，而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多少是带着藐视的。

黄河像一块尸布，这个意象的特别之处，在于感觉遥远，时空的遥远。亘古以来，曾经有多少生命在黄河的汹涌澎湃中起伏沉溺，并且最终流逝，而这样的宏伟与辽阔，在顾城的笔下浓缩得如此具象和生动。这就是顾城的看一切很近、也会很远的独特的视角，而且你根本不能去把握，顾城看什么会觉得很近，看什么会觉得很远。这就是我理解的顾城。

从未听到过顾城很具体地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写诗，也从未见到过顾城为写诗而陷入苦恼。他的阅读只是在浏览，他没有说过和想过自己要成为谁，他生来就是为了写诗的，他是居住在诗里面的诗人，诗构成了他的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悲欢交集的世界。

记得有一次在聚会中，顾城发起一个写诗的游戏，他出了个题目，让在场的六七位诗人轮着每人写一句诗，合成一首诗。我已经忘了当时顾城出的是什么题目，只记得似乎是和雨有关，我也忘了顾城写的那一句是什么，忘了我自己写的那一句是什么，但是我却偏偏记住了谢烨写的那一句：**雨把这一切打印在湖面上**。因为当时谢烨在说出这句诗的时候，做了一个打字的手势。

今天再想起谢烨的这句诗，万分感慨，是的，是雨融入了湖，而雨所打印的浪漫的一切，最终都融化成水，如果水生万物，那浪漫的一切还能再生吗？如果再生，那还会再有怎样的顾城与谢烨呢？人间还会有怎样悲欢离合的爱情？

人生或许就是一场雨吧，落下并且融化在水中。而诗，或者属于沧桑，或者属于上苍。

## 九

顾城终于与谢烨结婚了，记得是在1983年。他们去了谢烨妈妈的老家乡下，顾城回来向我介绍过那里当地的民俗。

半年之后，顾城终于要离开上海，离开武夷路小屋了。

在去北京之前，他把一部分诗稿装在两个小纸板盒里，让我拿回家，寄存在我家里，我们的告别很简单，我和他都觉得他很快会再来的。

顾城说他走后，武夷路小屋会让谢烨的弟弟去住。从此之后，我也就再没有去过武夷路小屋了。

顾城回北京后，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去看过他与谢烨，也和顾城一起去看一些写诗的朋友。

1987年，顾城和谢烨在出国之前来到上海，那时我也已经成家。他们来我们家里看我们。顾城告诉我他要去德国的事情，担心有关方面不批准，也担心谢烨的签证。说回去就要赶快去办出国手续了，甚至说如果他自己办不成，如果谢烨能够办成，就让谢烨一个人先出国。

顾城说，他和谢烨到上海，是在出国前来与谢烨的妈妈、弟弟告别，为了与亲戚朋友告别，也想再去做几套他喜欢的银灰色的中山装。

顾城说自己出国之前，有些上海的朋友是见还是不见，他很纠结，希望听我的看法，见或者不该见，可以按我的意见去做。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是顺从他自己的内心吧，如果不想见就不见吧，以后还有机会。他听了很是释然，谢烨也很高兴，说顾城为这个想了很久。

顾城告诉我，他与谢烨希望趁着这次出国，在国外多待些日子，因为邀请他去访问的国家与机构很多。我还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不回来吧？顾城和谢烨都说笑着说不会。

那时，我当然不会觉得自己一语成谶。

离开我家的时候，顾城带走了他存放在我这里的诗稿。我一直送他们到楼下，他们是推着一辆自行车来的，谢烨把装诗稿的盒子放在了自行车上。

顾城还很正式地谢了谢我，说我们好朋友这么多年，很想能多在一起。我说等你回来吧。我还用了一句苏联小说里的话说：山和山无法相会，人和人总会重逢。

于是，于是，我与顾城与谢烨，就成了再也无法见面的山。

## 蝉蜕

王安忆

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一转瞬，顾城他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文革期间，带来他在上海的堂妹，顾城应该称表姑的。巧的是，这一位亲戚与我们姐妹同在安徽一个县份插队落户，那个县名叫五河。后来我离开了，我姐姐则招工在县城，顾家妹妹凡进城都会上我姐姐处休整休整，过年回沪，也要聚，之间的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要这么排，我又可算在顾城的上一辈里去。事实上，这些关系最终都烂在一锅里，结果还是以年龄为准则，又因相近的命运和际遇，与顾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进大人的社交。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们家，进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当场表示拒绝，结果被母亲叱责一顿，硬是照了几张。奇怪的是，尽管出于不情愿，又挨骂，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开怀，厚颜得很。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听顾城讲演，是在香港大学吧，他有一个说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说，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当时听了觉得有趣，没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这累赘。不知脱离了身体的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又在哪一度空间？或者化为另类，在某处刻下如何的一部“石头记”！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清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这一淘气，“哄”走的可是寻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 1987 年，是 5 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

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也就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没有户籍之说，夫妻能够团聚，至于就业，看机会吧，顾城这样新起的诗人，正吸引着西方的眼睛。单是诗歌节、文学周、写作计划、驻校驻市作家项目，就可接起趟来。当年张爱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这些计划安下身来，站住脚跟，再从长计议。不仅生计有许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观。所以，看得出来，顾城谢烨即已出来，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样子了。就在旅途中，谢烨怀孕了。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

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的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后来，听说他们定居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这一个落脚之地，倘不是以那样惨烈的事故为结局，将会是美丽的童话，特别适合一个戴着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话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时又觉得天注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潜藏危机。这个岛屿不知怎么，让我总觉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并非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像出于刻意，刻意制造一种人生，准确地说，是一种模型。所以，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惟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谢烨说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话，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选择激流岛。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所有的细节都是凌乱破碎的片段，在反复转述中组织成各式版本，越来越接近八卦，真相先是在喧哗，后在寂寞中淡薄下去。也许事情很简单，最明智的办法是不作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惟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人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还是在那个柏林的初夏，我去“作家之家”找顾城和谢烨。说实话，他们的故事迷住了我，那时候我也年轻，也感到现实的累赘，只是没有魄力和能耐抽身，还因为——这才是决定因素，将我们与他们分为两类物种，那就是常态性的欲望，因此，无论他们的故事如何吸引，我们也只是隔岸观火。香港明报月刊约我撰稿



人物特写，我想好了，就写顾城，后来文章的名字就叫《岛上的顾城》。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个岛，所有的认识都来自传说，即便是顾城自己的讲述，如今不也变成传说之一？我沿着大街拐入小街，无论大街小街，全是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电车铛铛驶过，我问路的夫人建议搭乘两站电车，可我宁愿走路。走在远离家乡的美景里，有种恍惚，仿佛走在奇迹里，不可思议，且又得意。若多年以后，我再来到柏林，不知季候原因，还是年岁使心境改变，这城市褪色得厉害，它甚至是灰暗的。

我已经在那篇《岛上的顾城》中细述造访的情形，有一个细节我没写。当我坐下，与顾城聊天，谢烨随即取出一架小录音机，按下按键，于是，谈话变得正式起来。事实上，即便闲聊，顾城的说话也分外清晰而有条理，他很善表述，而且，也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多年来，想起顾城，常常会受一个悖论困扰，言语这一项身体的官能在不在累赘之列呢？我指的不是诗的语言，而是日常的传达所用，在诗之外，顾城运用语言的能力，以我所见也在他同辈的诗人之上。现在，谢烨按下了录音键，顾城想来是习惯的，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至遗漏，而被珍惜地收藏起来。过程中，谢烨有时会插言，提醒和补充——假如没有后来的事情，多么美好啊！但也终究不成其为故事，一日一日，一夜一夜，再瑰丽，再神奇，再特立独行，也将渐趋平淡，归于生活。就在他们讲述的时下，柏林之家的公寓里，不正进入着常态——一年计划的资助可以提供岛上房屋的用电之需。有时候，人心难免有阴暗的一面，会生出一个念头，我差一点、差一点点怀疑，顾城是不是有意要给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局，完成传奇。这念头一露头立即打消，太轻薄了，简直有卑鄙之嫌，谁会拿自己的、还有爱人的生命作代价！当你活着，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这里面一定有着严肃深重的痛苦，只是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只是光辉奇幻的表面——太阳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升起，再从东边落下；碗大的果实落了满地；毛利人；篮子里的鸡蛋；树林里的木房子，补上窟窿，拉来电线，于是从原始步入文明，再怎么着？回到野蛮，借用谢烨的说法，“奢侈”地回到野蛮！事情早已经超出了当事人的控制，按着自己的逻辑向下走……我们还是让他们安息，保持着永不为人知的哲思。用火辣辣的生命去实践的故事，或者说童话，不是哲思是什么！

有许多征兆，证明童话已经建构起来，顾城讲述的流利宛转，谢烨不断补充的细枝末节，各方汇拢来的信息基本一致，又有朋友去激流岛探望，亲眼目睹……就让我们相信它吧！即使在生活中不可能将童话进行到底，至少在想像里，尤其是，童话的主人公都去了天国，领得现实的豁免权。

那天，谢烨交给我两件东西，我一直保存着，谁能想到会成为遗物呢！一件是五十圆一张人民币，在1992年时候，发行不久，价值也不菲。她托我在国内买书寄她，无论什么书，只要我觉得有价值。我说不必给钱，她一定要给，两人推让几个来回，最终还是服从了她。另一件是一份短篇小说稿，手抄在三十二开的格子稿纸，这是一种不常见的稿纸，大小像连环画。字迹非常端正，可见出写字人的耐心，耐心背后是冗长的宁静以至于沉闷的时日，是那日头从东方升起往西方行行度去然后落下的时光吗？因为是复印稿，我相信已经发表过，依稀仿佛也在哪里看见，谢烨只是让我读读她写的小说。那时候，谢烨开始尝试写作小说，以前，她写的是诗，也是一个诗人。因为是顾城的妻子，就算不上诗人似的。

他们的故事里，有一个情节我没写，但相信一定有人写过，就是他们邂逅的经过。在北上的火车的硬座车厢，顾城是坐票，谢烨是站票，正好站在顾城身边，看他画速写消磨漫长的旅途。顾城是善画的，从星星画派中脱胎的朦胧诗人，都

有美术的背景，在激流岛上，有一度以画像赚取一些家用。就在那天，顾城也向我出示画作，不是素描和写生一类，而是抽象的线条，但都有具体标题，“这是谢烨，这是木耳，这是我。”他说。完全脱离了具象的线条，有些令人生畏呢，可不等到水落石出，谁能预先知道什么？火车上，他顾城画了一路，谢烨就看了一路，这还不足以让谢烨产生好奇心，令她忍俊不禁的是最后，画完了，顾城忘了将钢笔戴上笔帽，直接插进白衬衣前襟的口袋，于是，墨水洒开来，越来越大。这一个墨水渍带有隐喻性，我说过，他们的事，都是隐喻！墨水就这么洒开，一个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好比乐句里的动机音符，壮大起来，最后震耳欲聋，童话不就是这么开始的吗？谢烨就此与顾城搭上话，并且，第二天就按了互留的地址去找顾城。火车上偶遇互留通讯地址是常有的事，可大约只有谢烨会真的去寻找，真是好奇害死猫！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格，不放过偶然性，然后进入一生的必然。这才是诗呢，不是用笔在纸上践约，而是身体力行，向诗歌兑现诺言。那一些些诗句的字音，不过是蝉翼振动，搅起气流颤栗。当谢烨决定写小说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诗行将结束。小说虽然也是虚拟，但却是世俗的性格，它有着具象的外形。不是说诗歌与生活完全无干系，特别是朦胧诗这一派，更无法与现实划清界限，但总而言之，诗是现实世界的变体，不像小说，是显学。

关于他俩的文字太多了，有多少文字就有多少误解，包括我的在内。写得越多，误入歧途越远。我还是要庆幸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倘若今天，传媒的空间不知繁殖多少倍，已经超过实际所有，实有的远不够填充容量，必须派生再派生。活着的人都能被掩埋，莫说死去的，不能再发声，没法解释，没法辨诬。我们只能信任时间，时间不定能揭开真相，可什么是真相呢？也许事情根本没有真相，要有就是当事人自述的那个，时间至少能够稀释外界的喧哗，使空气平静下来，然后将人和事都纳入永恒，与一切尖锐的抵制和解。好比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最后的段落，听故事和讲故事的那个人，走过山坡，寻找卡瑟琳和希克厉的坟墓石楠花和钓钟柳底下的人终将安静下来。小说中还有第三个坟墓，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两个，我坚信两个人的事实。无论怎样猜测，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童话，其他都是枝节，有和无，结果都一样。我还想起巴黎南郊蒙帕纳斯公墓，沙特和西蒙·波瓦并列的棺椁，思想实验结束了，为之所经历的折磨也结束了，结果是成是败另说，总之，他们想过了，做过了，安息下来。墓冢就像时间推挤起的块垒，终于也会有一天，平复于大地。谬误渐渐汇入精神的润溪，或入大海，或入江河，或打个旋，重回谬误，再出发，就也不是原先那一个了。

二十年过去，还有些零散的传说，已经是前朝遗韵，我从中拾起两则，将其拼接。一则是听去过的人说，那激流岛其实并不如想像中的蛮荒与隔世，相反，还很热闹，是一个旅游胜地，观光客络绎不绝；第二则说，顾城谢烨的木房子无人居住，由于人迹罕至，周边的树林越长越密。听起来，那木房子就成了个小虫子，被植物吞噬，顾城不是写过那样的句子：“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对，就是吃虫子的松果。这样，童话就有了结尾。

在北岛终于安顿下来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应该是篆体吧，写的是“鱼乐”两个字。北岛让我猜是谁的字，我猜不出，他说：顾城！想不到那软软的小身子，永远不愿长大的小身子，能写下力透纸背，金石般的笔划，一点不像他，可就是他。人们都将他想得过于纤细，近乎孱弱，事实却未必。他蜕下的那个蝉衣，也许还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质地是坚硬的，坚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2013. 8. 1, 于伦敦

## 80后，怎么办？

杨庆祥

### 一、失败的“实感”

2011年1月17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放，据相关媒体报道：“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郜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袁隆平、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8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国家形象片不过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名片。北京奥运会总投入为3000亿，2010年广州亚运会总投入为1200亿（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50倍）。这些天文数字似乎一再证明了中国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让人疑窦丛生，这些花费无数的盛会、这些被巨大的摄像头所截取的场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谁”？

毫无疑问，59位进入国家形象片的中国人都是某一种成功的代表者，但这种“成功”因为经过镜头和意识形态的包装后反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不想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仅仅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在观看这一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兴奋，就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表演。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

想起来这种失效是不应该的。仅仅是在两年前的2008年，我还挤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轻人一道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沉浸在“大国崛起”的亢奋想象中。那个时候我同样是一个局外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大多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并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梦想就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但是这一次，这种想象被我严峻的个人生活现实所击碎，也就是在国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几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地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据每个房间的大小四个人分别承担1100/1600/1000/1300），因此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从2009年9月博士毕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19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12平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800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

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 12 平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 1000 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内，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做爱的欲望了吧。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 14 平米的小单间，月租 1300 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

选择这种稍显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 2004 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 2004 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候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八零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在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她已经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这种坚强和挣扎，也已经被过滤掉了。

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 GDP 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在 1968 年欧洲五月革命中，其学生领袖质问法国教育大臣：“政府花费如此多的钱来修建一个豪华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学生的性爱问题？”我房间里面的那对小夫妻却没有这种质问的机会，也许

他们只能让声音再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45000左右。2010被称为房地产市场最严格“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19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3万每平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每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的旧房子，在2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流传着一个“恶搞”计算方法，内容如下：

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是：

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 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 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

这个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如果说在198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奋斗”实现的可能性，在2010年，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80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1980年代的孙少安虽然出生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19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孙少安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资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孙少安们的成长，在2010年的媒体舆论中，最热炒的一个短语是：“我爸是李刚”。也就是说，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成功”还能算是成功吗？这样的“失败”是否有更复杂的内涵？

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最后我们已经无法在个人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了。当社会企图托管一切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只是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社会就生产了“失败”以及“失败者”本身。而失败者，在这种极端的绝望和无路可走的恐惧中，自然就会把这种失败归责于社会或者另外一个他者。也就是说，“失败”的实感虽然是个体的，但是“失败”的内涵却是相

互生产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失败的阴影是巨大的，以致于已经无法按照正常的价值标准来进行生活，在 2010 年一个收视率甚高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婚姻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房子、车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把身体商品化，并选择最好的商机把自己抛售出去，是参加这些相亲节目的年青人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高地去指责这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堕落，是否过于简单？如果社会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鼓励正常的生活和发展，那么，这些年青人通过“身体”的转让来获得利益是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改革之初的历史叙述中，完美的身体一直是改革者所拥有的傲人的资本，如《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通过“身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谁又能预料到，这些寄托了一代人的乐观想象的身体会在短短数十年后变成了只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和享乐。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失败？

无论如何，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一代青年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喧嚣中一个时代的痛苦，这个痛苦有些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有些却不能忍受，个体当然不能把个体的失败完全归责于社会，但是社会同样不能把失败完全归责于个体。我完全理解我在 2008 年为什么能够与这个社会和国家想象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年 750 元（也就是一个月 65 元不到）的学生公寓里面，享受着有保障的住宿、餐饮和学习工作资源，虽然简陋，但是却觉得安全而温暖。而从 2009 年 6 月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种实感与失败的实感纠结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的定位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个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的失败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临着这种失败的境况，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失败者的自觉？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失败中发现一些什么？

## 二、历史虚无主义

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比如李白在《将进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失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中，通过“留其名”把自我从当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失败者的勇气和胆识。但是对于今天的 80 后的青年人来说？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能否找到这种安置失败的历史位置和历史意识呢？也许不用和李白这些远古时代的文人相比，即使与前此的 1950 年代生人、1960 年代生人相比，问题也就立即呈现出来。在 2010 年 12 月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社科院的陈福民教授、批评家孟繁华教授一块从北京郊区驱车回城，当时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盘旋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陈福民和孟繁华两位突然唱起了《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想当初老

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哎！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哪！”“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我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是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以自然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1950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学潮等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今天我们来看1950年代生人，会发现他们存在很多问题，正如《新星》中的大学生批评李向南所言：“你们很世故，太爱权术。”但不容否定的是，正是这种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使得这一代人具有一种厚度和韧性，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对于80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以我个人为例，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之时，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1989年的事件对于我们依然是空白，我对此唯一的记忆就是发现晚上有很多人围着一个收音机在听广播，然后间或有人在说什么学生闹事的事情，但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丝毫没有影响到日常的生活。1992年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然后是2003年的SARS事件，我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再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后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所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的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我就立即打电话约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需要忏悔的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我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我随后为自己的这一想法而惭愧万分，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我知道一个80后诗人很冲动地就去了现场，但是因为完全没有志愿者的经验，他立即就感染上了细菌，然后成为了一个被“救治者”，更荒唐的是，他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倾诉和求助，并抱怨当地的医疗和饮食。也许会有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是为了尽一份力量，但是，也不能排除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地震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嘉年华，一幕无与伦比的大戏剧，我们希望参演成为戏剧的主体。我当然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一场大灾难会变成一个大狂欢？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席。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上面我列举的种种历史事件已经证明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充满了戏剧和动感的，但是与“十七年”和“文革”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比起来，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



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席的一代。因为这种历史存在感的缺席，导致了80后面对历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一就是如大地震以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上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参与的高度的热情，在这样一种参与中，80后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感，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暂时性”表明了这种存在感的虚无；这就是第二点，因为对于历史存在已经失去了信任，索性就彻底放弃了这种历史的维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这是在80后青年人中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倾向。

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地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全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这种戏谑与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王朔式的调侃完全不一样，在王朔那里，调侃的对象始终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但是，80后的这些调侃是完全任意性的，并没有什么目的，在这种言行中，生活本身的严肃性被取消了。今天的80后青年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在历史虚无主义中，事物的神圣性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80后的主体呈现出了什么特征？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阅读症候里面窥探出什么。2010年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热闹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刊载了80后作家郭敬明的《爵迹》，由此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和纷争，反对者以为这是文学向市场和庸俗阅读趣味的投诚；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变。抛开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不谈，毋庸置疑，郭敬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之一。《小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时，当期《人民文学》销售一空并不得不加印，这是19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唯一一次加印。而《收获》同样因为刊发《爵迹》而销售量翻倍。批评家郜元宝在《评〈爵迹〉》的文章中遍挑语病，极尽嘲讽挖苦，这种批评虽然解恨，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找到要害。虽然我同样鄙夷郭敬明小说中的技术含量，并对郭敬明如此“成功”满怀“嫉妒”，但我还是试图去理解这样一种写作和阅读。这里面肯定是内涵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以往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已经不可解释了。7月份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它并不在意它能提供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程序，你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完成阅读，同时也就获得了快感。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小时代》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书掉在地上，里面随书赠送的郭敬明的照片滑落出来，我的理发师帮我拾起来，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家理发店发的宣传册啊？”这句无心之语饶有趣味，他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来看郭敬明的时候，他认定其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其理由是郭敬明“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发型。作家不再是忧心忡忡蹙眉深思的“大作者”了，他现

在是一个表象化的演员，写作被取消了“内面”。在《小时代》的扉页里有一张三十二开的彩色插图：一群俊男靓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聚集，其中一位男子坐在一个大镜子前，两个女性在旁边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另外几个男女在一角窃窃私语，还有一个女性站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似乎在拍摄一切。我觉得这幅插图比任何郭敬明的小说都更能表明我们这个时代（郭敬明所谓的小时代）主体的存在状态。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像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阅读）自己。或者说，“镜子”和“摄像机”已经成为了“主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必须通过这样的主体把自己“物化”，并找到存在的实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中，始终还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非常清醒地持有其主体意识，并对世界作出价值上的臧否。但是对于 80 后而言，这一第三者消失了，或者说，第三者已经完全把自己转化为一个同一性的身份，“看”与“被看”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被抹平，在此，80 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乐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

历史的虚无主义对于 80 后来说并非意味着没有历史，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历史总是存在的。80 后也轻易就能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 80 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 80 后的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

### 三、抵抗的假面

竹内好在谈及日本 1950 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欲望，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通过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我以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大概都面临着如竹内好所言的问题和困惑，在他们还没有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的时候，他们大概还能耽溺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自我安慰，但是一旦面临生活的真实的境况——正如我在 30 岁时才强烈感觉到的失败感——

他们立即就会明白，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现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被转移到了更年轻人的手里，而自认为长大成人的“80后”们会问：“今天你读‘韩寒’了吗？”

最早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摊点翻书，一个朋友指着《三重门》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几门成绩挂红灯的高中生写的小说。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几乎没有任何印象。2007年以后似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记得有一次张悦然在飞机上对我说：“‘韩寒’现在是公共知识分子了。”这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崇高非常神圣的名词，它和一连串的经典人物联系在一起：萨特、福柯、萨义德、鲁迅等等。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80后”青年怎么就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呢？他是怎么公共？又是如何知识分子呢？但不管如何，“韩寒”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实。在北京的地铁站里，“韩寒”为“凡客”代言的巨幅广告矗立在每一个过客的眼前，打开电脑，各大门户网站经常性地跳出“韩寒发表××”等内容，用一句网络流行词来说，我被“韩寒”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韩寒”多么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都成了一个被刻意放大和赋魅的“事件”。《北京青年报》文化版的一个记者曾对我说：“‘韩寒’是文学圈内唯一有新闻效应的人，而且效应很大。”她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解释“韩寒”现象的一个切入口。“韩寒”是文学的，同时又是新闻的，“韩寒”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合谋的，或许正是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能够获得一致的认可。中国某教授就曾经夸大其词地说：全中国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大不过“韩寒”。在《上海文化》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韩寒”被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徐贲在《美国人看不懂韩寒》中也认为：“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作为一个作家的“韩寒”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韩寒”或许都有其值得赞誉和信任的地方，在很多人看来，“韩寒”的魅力来自于他的抵抗的姿态和抵抗的方式，抵抗的姿态是指，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对社会公共事件作出反应，并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说出真话：“韩寒的话语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的全新见解。”另外一方面，就抵抗的方式来说，“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于是，韩寒的4.5亿的博客点击率就成为了一种“抵抗”的标志。

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有人对此发言，有些人发言会好一些，有些人发言会平常一些，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像这样把“韩寒”的一些博文提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这或许也只有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吧。“韩寒”或许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相信说这样真话的人在中国很多，而这些人因为缺少表达的平台，也缺乏相应的传播条件，所以就被遮蔽了，而在遮蔽这些发言的同时也就无限夸大了“韩寒”言论的正当性。如果说“韩寒”确实在实施一种抵抗，那么在我看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媒体的抵抗”，“媒体

的抵抗”的特点是它的指涉是单一的，它抵抗的对象是确定的，它抵抗的内容是公共话题中最讨巧的一些东西。在“韩寒”博文中最常见的是对于政府腐败的嘲讽和调侃，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腐败确实是需要抵抗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话题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让我担心的是，“韩寒”的这种看来很“新鲜”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可能潜藏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很多重要的问题被表达的形式所掩盖了。如果说得刻薄一点，在“韩寒”的很多博文中，有一种巧言令色的成分，他既没有从根本上去廓清一个问题，也没有在表达上给现代语言提供新颖的东西。

在我看来，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他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但是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欣赏“韩寒”之处，他们知道，真实的抵抗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而这种抵抗的“假面”，则是共赢而无害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博文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里面的某种利益关系：“在有些人眼里，从公众人物到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完成了新世纪的华丽转身。也许有人会说时代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也变了，是的，时代变了，网络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用不着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发表宣言、起草联名信、上街游行了，他们只要在职业之余，上一上网，人肉些必要‘信息’，再在博文里留下几句损政府、嘲弄世道人情的绝话以充当‘檄文’，然后就会在顷刻间传遍整个网络，成为网友们泄愤的暗语。别小看这些绝话，那还真属韩寒的绝活，作家的言辞技巧，到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魅力。”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韩寒”有这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依然代表了某种勇气。我想每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保持必要的正义之心的人，可能都希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去发言。而这种勇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我还记得2006年我刚刚博士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宿舍管理科突然颁布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规定：禁止异性进入每一个学生公寓楼。这条规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明显，这是一个管理者为了推脱管理的责任而无视学生人权的做法。因为找不到实际解决问题的渠道，大家就在学校BBS上发表抗议的言论，当时我一连发表了两个帖子，表达对学校这种管理制度的不满，因为语言“过激”，很快学校的管理部门就找我谈话，我记得当时一个管理人员对我说：“你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警告我不许再发表相关言论。这一个小小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真实的表达可能都是要冒风险的，不管这风险是大还是小。所以我对“韩寒”的质疑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难以企及和做到的。我对他的求全责备与其说是出自一个批评家吹毛求疵的职业习惯，更不如说我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对“韩寒”抱有更多的希望，我希望他的抵抗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思考品质——而在我看来，文学比短小的博文更能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希望“韩寒”能从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角度来完成抵抗——我将之命名为“文学的抵抗”——也就是他通过文学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但关键问题是，“韩寒”因为过于受制于他的“媒体抵抗式”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严重损害了他文学式抵抗的品质。

在 2010 年推出的重要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韩寒”似乎企图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来更全面地表达他的思考。我是满怀希望地在第一时间内读完这部小说的，但结果非常失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很蹩脚的小说，即使连韩寒的“粉丝”们也不得不对这部小说持保留的态度，我在豆瓣网上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比如曾小小认为：“韩寒的东西看多了也就那样了，没什么意思，也启迪不了我，也帮助不到我……只能解气”；[coldyuye](#)认为：“他的小说是他的杂文的延伸 小说并非他最擅长的 他有些随意了 其实他也许该多花些时间和功夫在小说上 正如你说的‘社会现实给了韩寒太多的素材，可韩寒并没有完美地使用它们’”；[echocheng](#)说：“我只看过三重门，还是读高中那会。高一那会，[twocold](#) 同学很火啊，于是我就颠颠地看了他参加萌芽的复赛作文，以后就没看过。博客里充斥着自已什么都看透什么都嘲讽什么都无谓的调调，不太喜欢”；[Wense](#)说：“平时韩寒的博客我也是不看的，就像你朋友说的那样，没什么意思，何必浪费时间在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上呢？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产物，有多少人是‘被韩寒’了，这显然很符合人们从众的心理。博客来造势，杂志来煽情，再搞本小说来圈钱——看完这本书，没留下什么印象。”

这些豆瓣网友的评论大概代表了某种很真实的声音，分析也非常到位（同时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读者”或者“点击率”是需要进行分层讨论的，仅仅凭借数目字并不能说明韩寒的重要性）。在《1988》这本小说中，媒体式的写作代替了文学的写作，媒体式的嘲讽取代了文学式的戏谑。“韩寒”甚至都不会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中断，通过回忆来把故事推动下去。一方面是简单的“80 后式”的怀旧，一方面是简单的对于政府和体制的解构，这就是《1988》的全部内容。与奥威尔的《1984》相比，“韩寒”的写作显得矫情而缺乏格局。在《途中的镜子》中，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1984》不仅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更是一个带有实验色彩的典型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通过这一有效的文学形式，1984 作为政治寓言的抵抗力量才凸显出来并成为历史的坐标。但是在《1988》里面，粗糙的形式和芜杂的材料被强硬地拼贴在一起，“韩寒”在此甚至很难说是一个有意识的作者，而完全像一个中学生在写一份命题作文。他缺乏现代作者最基本的一个向度，那就是他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我看来，“韩寒”的“自我”是一个表面化的自我，因为他高度地执着于这种表面化的自我，他就从来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他怀疑和嘲讽一切，但是却从来不怀疑和嘲讽自己——因为这种真正现代自我意识的缺乏，“韩寒”的抵抗，无论是媒体式的抵抗还是文学式的抵抗，都缺乏真正洞察的眼光和震撼灵魂的力量，这种抵抗的“假面”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如影随形，阴魂不散，“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80 后”的一体两面而已。

#### 四、怎么办？

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 80 后这里不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更是历史

问题，它意味着，80后必须从头检视自我的历史，从起源开始追问。这个“起源”在我看来，一个是生理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事实。生理上的事实是，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在十年前也许不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今天需要特别严肃地提出来，因为经过30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80后的成长同时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秩序中的全部降格。在1970年代，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而自豪，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高唱“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到了200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对农民和工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嘲笑。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80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从起源开始，80后就不是在获得，而是在失去——“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全部世界”。

但似乎有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普遍实行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我于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历。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那些已经完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面没有我们的田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我更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其实并没有童话，我们的童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2012年合肥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我依然看到一个和我年龄仿佛的青年在认真阅读这本书——它实际上不过是告诉你怎样做一个资本的螺丝钉。

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在每一个8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是的，小资产阶级之梦——至少在2009年以前，这个梦还不能说是白日梦，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理想和追求。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梦有些含糊，但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它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有时候，这种小资产阶级之梦以一种夸张和变形的的方式得到发泄和阅读，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冬天，我在安徽小城的一个书店里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站在书架前一气将其读完，并激动地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叛逆，带着种种的青春期的冒险。我在那个时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通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

现在看来，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它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经典的《看不见的城市》，男人们追逐梦中的女性，最后没有得到，只好建造一座和梦中一样的城市，卡尔维诺说如此女人塑造了男人。小资产阶级之梦就是那个女人，最后，我们并不能得到它，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这种幻象甚至治愈了我



们的失败感，它给现实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以为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忘记了起源同时也切断了未来，80后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

小资产阶级是80后最后的救命稻草，意识形态的规划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各种奋斗、学习、发展的概念都依托于小资产阶级之梦的最后实现。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但现实情况是，这个梦的兑现被一再延宕，最后这个梦以残酷的形式刺破了80后“虚假的”当下生活。在80后作家张悦然这里，这种幻灭以离家出走的形式被讲述出来，在2010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家》中，张悦然以极其罕见的成熟书写了一对典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和新生。这对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不再满足于刻板的、看来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充满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日常生活，同时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被再一次激活，在鲁迅、巴金那几代人那里，离家出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破除宗法式的大家庭而营造一个可以安置个体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而在80后这里，因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预设的“程序”，因此，再次离家出走似乎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张悦然的故事显然带有一定的预设的成分，已经被巨大的日常生活的幻象控制的小资产阶级真的敢离家出走吗？另一位80后女作家马小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马小淘的中篇小说《毛坯夫妻》里，同样是一对年轻的小资产阶级男女，当他们在资本的等级制度里感到压迫和侮辱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极其温驯的姿态回避了本来可能出现的尖锐的心理冲突，我想说这可能更接近80后的现实状态：不仅外在的冲突消失了，内在的冲突——自我反思和自我求证的冲动也被“阉割”，80后退回到社会的最隐蔽的角落——卧室或者是电脑的终端，甘于成为资本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关节点——也就是当下在媒体的宣传中日益合法化的“宅男”或者“宅女”。

无论是离家还是回家，在我看来都意味着“家”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之梦的破碎。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的境况。从表面上看来，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在不停地造就大批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改革的意识形态，但是实际情况是，小资产阶级在当下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现实出路也许是赤贫化，成为新的城市无产阶级。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格非在其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变为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并非那么让人沮丧：男主角又暂时获得了爱情和房子，但现实生活却不可能有这么“光明”的尾巴，现实是，在世界资本和官僚权贵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失败”的道路可以选择。

这一“失败”之途似乎是预定的，充满了世界史的宿命味道。它超越了简单的代际的划分，中国的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种现实迫使我们重返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公平、正义、反抗和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到了中国现代的逻辑起点：我们面对的着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一个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这就是80后所处的世界史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独享”的，也无法简单地拒绝或者认领，这个位置，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结实的主体去予以激活和对接。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实习一个月以后给我发来短信：“我终于体验到了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感觉了”。

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

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

2012/10/29 于北京寓所

2013/1/1 再改

附记：本文动笔于2011年2月，第一、二、三部分完成于2011年年底，第四部分完成于2012年年底，整个文章完成耗时近两年，很多的想法、表述都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并带有天然的偏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第三部分“抵抗的假面”，我一直将“韩寒”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非独立的个体，因此在文章写作的一开始我就在“韩寒”两字上打上“双引号”以示强调。2012年春，对“韩寒”身份和写作的质疑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我对此非常关注，对论辩双方的材料多有涉猎，此事件坚定了我对“韩寒”作为一个“符号化”存在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让我感慨中国当下文化（文学）生成的诡异纠葛。此部分的一些表述，如“韩寒的勇气”“我对其抱有更多的期望”之类云云，如今看来真是过于天真幼稚，历史的黑箱一旦戳破，里面原来是嗜血般的阴森可怖。但我愿意将这些表述和判断留存，批评的勇气在于：你要戳穿别人的假面，必先将自己的真脸示人！（2013年1月1日）



